

顾清扬

过去数年，国际舆论谈及中国经济，关注点大多集中在几个老生常谈的难题：房地产的持续低迷、居民消费不足、经济增速放缓。这些挑战确实存在，但并不足以完整反映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。2026年上半年展现出一个较少受到国际关注的新趋势——一场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型正在展开，而这一变化的重要性，或许超过短期经济增速本身。

2026年前五个月，中国制造业创下2020年以来最佳季度表现。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重回扩张区间，工业企业利润明显回升，工业生产与新订单规模持续改善；货物与服务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，高附加值制造品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拉动外需的核心动力。相比之下，房地产市场仍处在调整周期，居民消费复苏步伐平缓。

综合各项指标不难看出，相较于以往增长周期，中国经济增长正转向更加依靠制造业、科技创新和出口驱动的新增长格局。

这一转型值得全球关注，这一变化不仅关系中国经济未来，也折射出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层变革。

近年来，产业政策重回各国经济战略核心。美国大力推进制造业回流，欧盟加速绿色产业转型，日本重振半导体产业，韩国则持续扩大对高新技术的投资。今天，各国政府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，更加重视技术自主能力、供应链韧性以及国家安全。

放在这一大背景下，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结构调整，并非孤立现象，而是全球产业体系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——技术、地缘博弈与产业政策三者的关联正变得愈发紧密。

驱动这场转型的关键变量，正是持续多年的中美战略竞争。

过去几年，美国不断加强对中国高端半导体、关键制造设备以及关键核心技术的出口管制，试图延缓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进程。

然而，经济史一再证明，外部压力往往会催生预料之外的结果。

外部压力时常倒逼内部产业调整。1970年代石油危机后，日本加速迈向高端制造；亚洲金融危机之后，韩国加速技术迭代。不同历史阶段的经验都表明，外部约束未必是增长阻碍，反而能成为推动产业转型的重要催化剂。

今天，中国正走上一条相似但规模更为宏大的

地缘政治如何重塑中国经济

中国经济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结构性分化：一端是高端制造、数码技术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等优势赛道；另一端是传统产业、中小企业与普通家庭，他们尚未能够充分分享这一轮产业升级所带来的红利。

发展路径。

面对日益收紧的技术限制，中国持续加大对半导体、人工智能、高端装备、可再生能源以及数字经济等战略产业的投入。与此同时，民营企业也不断调整投资方向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夯实自身技术实力。

高技术制造业逐渐成长为中国工业体系中最具活力的板块。经济增长动力逐步转向依托技术创新、工程能力以及完整产业链支撑的新兴产业，不再单纯依靠低成本劳动力。

出口结构升级是最直观佐证

出口结构的升级是这一转型最直观的佐证。

20年前，中国出口优势集中在服装、家具、家电等日用消费品；如今，机械设备、工业装备、储能系统、电子元器件，以及人工智能、数码技术相关产品，成为出口增长主力。

这场转型，不仅反映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，也折射出全球需求结构的新变化。

当下世界正在经历两场同步推进的工业化。

一方面，全球南方国家仍处于工业化、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发展的阶段，对电力网络、工业设备、交通装备、能源系统需求持续激增；另一方面，发达经济体则进入再工业化新周期，各国大举布局人工智能、数据中心、新能源、高端制造，不断推高对半导体、工业自动化设备、电力装备以及工业中间产品的需求。

两类经济体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，却同步催生对资本品和生产资料的旺盛需求，传统消费品需求则相对下降。

全球需求结构的新变化，重塑中国的比较优势。

经济学研究显示，比较优势并非一成不变，会随技术、资本、制度持续演化。中国近年发展实践表明，地缘政治正在成为推动比较优势演进的新变量。中国正逐步摆脱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模式，转而凭借完整制造体系、工程研发能力、庞大产业生态，形成新的全球竞争力。

出口市场布局同样也在不断优化。中国同亚细安、中东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贸易规模稳步扩容，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不断降低，提升应对地缘波动的抗风险能力；同时，对发达经济体出口仍保持相当规模，重点集中于产业升级、全球能源转型相关产品。

综合来看，中国近期出口向好绝非单纯周期复苏，背后是产业能力、出口结构、海外市场布局的全方位重构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当初旨在遏制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竞争，反倒加速中国期待已久的结构性改革。

当然，仅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，还不足以解释中国今年上半年的经济表现。

如果说，中美战略竞争倒逼中国产业重塑；过去一年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缓和，则成为另一个看似矛盾却同样重要的影响因素。

战略竞争仍是中美关系的主线，双方围绕科技、安全、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分歧，短期内难以消除。但两国高层多轮沟通和谈判，并于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元首峰会，释放出双方愿意加强竞争管控、避免矛盾滑向全面对抗的重要信号。

这一变化，对于经济而言具有重要意义。对企业而言，竞争本身尚可适应，不可预测的政策波动才是最大风险。企业可以适应关税调整、监管变化以及市场竞争，但最难应对的是政策突然转向、限制措施不断升级，以及全球供应链随时可能中断所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。

“可控的战略竞争”

正因如此，中美沟通机制逐步恢复和相关共识的初步达成，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过去几年困扰企业和投资者的不确定性。尽管地缘风险远未彻底消除，战略竞争也未终止，但至少使市场相信，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，仍有望在相对可预测的框架下得到管控，而不是不断升级直至失控。

这种新的中美关系状态，或许可以概括为一种“可控的战略竞争”：战略竞争态势依旧激烈，但双方均清楚无节制冲突将付出高昂代价。

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，中美深度嵌入全球贸易、金融、技术网络。双边关系不确定性下降，不仅有助于跨国企业恢复投资信心，也有利于全球供应链稳定以及国际资本跨境流动。在地缘冲突多发的当下，即使只是

战略稳定出现有限改善，也可能产生超预期的经济影响。

然而，上面关于结构性变化的讨论，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是一帆风顺的。

房地产市场仍在经历调整和寻找新的供需平衡；大量中小微企业压力尚未有效缓解；居民消费虽有回暖，但恢复速度仍明显落后于制造业和出口；高技术产业创造的财富和增长动能，也尚未充分传导至整个经济体系。

这些现象反映出，中国经济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结构性分化：一端是高端制造、数码技术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等优势赛道；另一端是传统产业、中小企业与普通家庭，他们尚未能够充分分享这一轮产业升级所带来的红利。

这种分化并非中国独有，而是历次重大技术变革时期均会出现类似特征。

生产力提升往往先作用于生产端与投资端，再逐步转化为薪资增长、就业增长、居民消费提振。

在人工智能时代，或许同样如此。人工智能、新能源和数码技术能够大幅提高生产效率，并催生新的产业体系，但这些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更高工资、更充分就业和更强消费能力，仍需要一个相对长的扩散过程。

政策制定者面临双重任务：既要持续激励创新，也要推动创新成果全民共享，使经济增长更加均衡、更具包容性。

过去几十年，中国经济的崛起主要依赖城市化、基础设施建设、房地产开发以及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出口。这些增长动力并未完全消失，但已不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唯一力量。创新、高端制造、生产效率提升、高附加值出口，正逐步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力量。

以此视角审视，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最值得关注的，并不是增长指标的多少，而是增长模式本身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
原载《联合早报》旗下英文电子杂志
“思想中国”（ThinkChina）

